

从近年新见吐蕃金银器看青藏高原 多民族的交流与融合

霍巍 祝铭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5)

摘要 近年来,随着青藏高原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一批精美的吐蕃时期金银制品陆续被发现。这些吐蕃金银器虽然形制、风格各异,但大都呈现出多元的文化内涵。从中可以窥见来自西藏本土、中原唐王朝、北方草原地区和青海吐谷浑民族的文化因素相互交融,是吐蕃时期青藏高原与其周边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真实写照,为探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演进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提供了考古学实证资料。

关键词 吐蕃时期;金银器;文化因素分析;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DOI:10.16249/j.cnki.1005-5738.2023.04.002

中图分类号 K876.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738(2023)04-014-010

青藏高原位于祖国西部边疆,青藏高原的考古工作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各族人民克服种种困难,一同缔造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文化,最终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在此过程中,边疆地区与中原内地的文化互动成为重要的内在动力,也成为各民族之间文化交往、交流和文化认同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拟对一批近年新发现的吐蕃时期金银制品进行分析和研究,就其在造型、纹样、工艺等方面所反映出的文化因素进行讨论,进而探究吐蕃时期青藏高原各族群与周边地区在文化上交往交流交融的历

史线索,阐释其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径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历史演进的宏大格局。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吐蕃时期的金银制品,可称之为“吐蕃系统金银器”,或简称为“吐蕃金银器”^[1]。在研究和讨论之前,有必要对这一概念进行界定和阐释:根据青藏高原历史发展和考古发现的实际情况,吐蕃金银器主要流行于公元7世纪吐蕃政权建立之后。故本文所涉及考古材料的时间范围大致为公元7世纪初至9世纪中期,空间范围包括吐蕃本土及其占领地区。换言之,吐蕃金银器即指吐蕃统治区域内的人群制作或使用的金银制品,其中既包括本地制作的器物,也应当包括输入到吐蕃为吐蕃人使用的舶来品。

收稿日期:2023-10-01

第一作者简介:霍巍(1957-),男,汉族,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唐考古、西藏考古及艺术史等。

一、近年吐蕃金银器的新发现及其主要特征

20世纪以来,吐蕃金银器开始走进学界视野,并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讨论。^[2]马萨·卡特(Martha L. Carter)^[3]、阿米·海勒(Amy Heller)^[4]、许新国^[5]以及本文作者之一的霍巍^[6]均对以往发现的吐蕃金银器有过较为充分的讨论。本世纪20年代以来,随着青藏高原一系列重要的考古新发现和几次大规模的吐蕃时期文物展览的举办,一批新的吐蕃金银器材料陆续被发现和挖掘。在这批新材料的背后,有若干重要的考古学文化特征亟待探究。

根据来源不同,可将近年新发现的吐蕃金银器分为三类:一是考古出土器物;二是公安部门追缴回的盗掘文物;三是国内外博物馆、私立机构或私人手中的收藏品。现按其来源分述如下,并结合相关材料对其性质及年代略作说明。

(一)考古出土的吐蕃金银器

2018~201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对乌兰泉沟一号墓进行发掘,这座墓葬是迄今为止在青藏高原发现和发掘的唯一一座吐蕃时期壁画墓,兼具吐蕃、青海本土、中原唐王朝等地的丧葬因素。该墓后室出土鎏金银带饰21件,更为重要的是在西壁外暗格内出土1件鎏金银冠和1件镶绿松石四曲金带把杯。^[7]这两件金银器制作极为考究,是多元文化影响下的产物,对于研究青海地区多民族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2018~202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都兰热水“2018血渭一号墓”进行考古发掘。这座墓葬是目前青藏高原地区发现的布局最完整、结构最清晰、形制最复杂的高等级墓葬之一。墓葬中出土了大量明显带有中原文化色彩的遗物,其中出土金银制品1207件(组),类型包括印章、带把杯、细颈瓶、首饰、牌饰、带饰、马具、覆面、饰片等。^[8]上述发现极大地丰富了吐蕃金银器的讨论材料,通过与该墓所出土金银器的比对,以往流散各地的吐蕃金银器材料得以确定年代与性质。

2020~2021年,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拉萨当雄墓地进行发掘。当雄墓地是迄今为止在吐蕃中心区域内

首次发掘的高等级墓葬,从目前已披露的相关资料可知,墓地出土的金银器有雄狮凤鸟纹金耳勺、植物纹金饰件、镀金铜覆面、银带扣、金珠、银珠、狗头金等。^[9]

(二)有关部门追缴的吐蕃金银器

青海一带吐蕃时期的墓葬分布密集,出土随葬器物数量丰富,很早就引起了社会不法分子的注意。大量墓葬曾被盗掘,墓中诸多随葬品流散到各地,失去了原有的埋藏信息,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所幸在公安部门的努力下,不少盗掘文物被追缴回并移交到相关文物部门,挽回了一定的损失。部分追缴回的文物虽然已经失去了明确的出土信息,但经盗墓分子现场指认及与出土器物的对比研究,基本可以确认是吐蕃时期的遗存。现将其中涉及金银制品的追缴情况简述如下。

2018年青海省有关部门破获“3·15热水墓群被盗窃案”,收缴被盗文物646件。经笔者初步统计,目前已公布的金银器材料有29件(组),类型包括细颈瓶、带把杯、贴金银盘、贴金锡盘、贴金盘口锡瓶、鞍饰、马具、带饰、覆面、牌饰、饰片等。^[10]这批文物与日后发掘的“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金银器联系密切,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器物组合相似,均有金细颈瓶、金带把杯、银盘、金马鞍饰、金杏叶、人物饰片、动物饰片、覆面等;(2)部分器物造型一致、尺寸接近,如瓶、杯、杏叶、鸟纹牌饰、覆面等;(3)部分器物纹样风格统一,应为同一组器物,如出土的前鞍桥饰与追缴的后鞍桥饰应同为一个马鞍的饰件。结合盗墓分子对犯罪现场的指认情况,有理由认为部分盗掘器物原应出自“2018血渭一号墓”。

海东市化隆县公安局曾向有关部门移交2件银铜合制细颈瓶和1件银铜合制盃指壶,现藏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博物馆。这三件器物虽非近年所获,但以往学界对其关注度不高,直至2019年首都博物馆举办的“山宗·水源·路之冲——‘一带一路’中的青海”展览中被展出,^[11]才得以让更多的研究者知晓,故列于此处加以介绍。

2020年9月,西藏山南市博物馆正式开馆,在其中一个展柜内展出一批金银制品。据馆内工作人员介绍,这批文物系2006年山南浪卡子一处岩

坑内出土,最初为当地民众在采石过程中发现,大部分器物已经散失。经浪卡子县公安局收缴回的文物约40余件,其中金银制品包括16枚萨珊银币、1件鎏金银盘、2件银饼、1件银条、5件银腰带、2件银饰、14枚银戒指和5件金牌饰。结合银币纪年铭文与既往考古发现,这批器物的年代均在8世纪中期以前。^①几件金牌饰与热水墓地追缴的金牌饰在纹饰、制作工艺等方面展现出高度的相似性,显示出共同的文化渊源。

(三)新近公布的馆藏文物或私人藏品

笔者近年于国内各大博物馆考察时发现,不少馆内收藏的金银制品可归入吐蕃系统,较为明确的有青海藏医药文化博物馆、湟源县古道博物馆、海西州民族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青海省博物馆、都兰县博物馆等。这些藏品有些征集自民间,有些为追缴文物,有些则是考古发掘所获但未经正式报道的文物。目前,他们当中的部分材料随着相关展览出版的图录被公布,^[12]还有部分藏品已经引起若干学者的关注和研究。^[13]

近年公布的私人或私立机构收藏的吐蕃金银器有:普利兹克藏品(Pritzker Collection)^[14]、瑞士阿贝格基金会(Abegg Foundation)纺织品研究中心藏品^[15]、阿勒萨尼藏品(The Al Thani Collection)^[16]、戴克成(Christian Deydier)藏品^[17]、瑞士苏黎世(Zurich)藏品^[18]、卡洛·克里斯蒂美术馆藏品(Carlo Cristi Collection)^[19]、美国私人收藏品^[20]、香港私人收藏品等。^[21]这些流散文物数量较多,种类繁多,其中不乏精品器物,虽然失去了最初的出土信息,但通过细致的对比分析,可以判断其性质、年代及大致来源,对于构建吐蕃金银器器物群具有重要意义。

(四)吐蕃金银器的主要特征

上述新发现材料较为零散,但若加梳理与整合,再结合既往发现的吐蕃金银器,仍可发现其所反映出的若干考古学文化特征。

首先,这批器物的类型较为丰富,根据用途不同可以将其分为容器、马具、装饰品、殡葬器、日杂器、饰片等几大类,几乎涵盖了吐蕃贵族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从造型上看,这些吐蕃金银器具有很

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与同时期周边地区如唐、粟特、波斯萨珊等地的金银器相比,既有相似性,又有明显区别。以容器为例,吐蕃金银器流行圈足器,少见平底器和圆底器。器型流行带把杯与细颈瓶,其中吐蕃带把杯与唐、粟特地区的带把杯既有共通之处,又有明显差异,区别表现在吐蕃带把杯更加厚重的胎体和更加低矮的造型。细颈瓶是吐蕃金银器中独有的形制,在其他各周边文化中罕有发现,最能代表吐蕃金银器的风格与特色。此外,从发现的各类饰片和饰品来看,吐蕃贵族十分钟爱以金银装饰身体、马匹、器具、居址和墓葬,具有极其鲜明的草原游牧民族文化特色。

其次,这批吐蕃金银器上装饰的纹样十分华丽和繁复,可分为动物、植物、人物和几何纹样四类题材。动物纹样题材包括狮、马、鹿、羊、象、猴、骆驼、龙、虎、凤、鸳鸯、孔雀、鹅、鸭、鱼、兽面等十余种,其中以狮、马、鹿、羊、龙、凤、象、鸳鸯等几种题材较为常见。在这些动物当中,有些栩栩如生,与高原民族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动物别无二致;有些则头生双角、肩生双翼,并非现实生活中的动物,而是具备神祇性质的“神灵动物”。植物纹样包括忍冬纹、葡萄纹、莲花纹、折枝纹和团窠纹,其中使用最为广泛的是忍冬纹。人物纹样分为外来人群和吐蕃人群两类,又可进一步细化出写实人物、抽象人物和神祇人物,是吐蕃人民生活、对外交流和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几何纹样流行连珠纹和鱼子纹,主要作为辅助性装饰使用。金银器上各类纹样的频繁出现,显示出吐蕃人在审美观念和创造美术方面,都已经具备相当高超的艺术水准和创造能力,既能从本土文化中汲取养分,又能够广泛吸纳其周边各地区、各文明的精华并加以融汇贯通,展现出吐蕃金银器独特的装饰艺术面貌。

再次,这批器物展现出较为完备和成熟的制作技术。铸造成型工艺很早便为吐蕃工匠熟练掌握,早期胎体较为厚重的金银容器即为铸造而成。后因铸造技术耗费材料,且难以满足吐蕃贵族对于更加精细化器物的需求,逐渐为锤揲工艺所取代。锤揲工艺一度成为吐蕃金银器皿制作的主流工艺,不少华丽、精美的纹样亦由锤揲工艺制出。在使用锤

① 祝铭,伦珠群培:《西藏山南浪卡子县发现一处金银器窖藏》,待刊稿。

揲工艺制作金银器时,还需要将加工后的各部分金银片连接成形。制作较为复杂的器物,还要将盖、流、耳、把、圈足等附件连接到主体器物之上。从这批新发现的材料来看,吐蕃工匠已经能够熟练掌握焊接和铆接两种连接工艺。器物成形之后,工匠们还通过篆刻、鎏金、包金、贴金、镶嵌、掐丝和金珠焊缀等各种工艺在器表施加不同的纹样。总的来看,综合使用多种工艺技术对器物进行制作和装饰是吐蕃金银器的一大显著特征。

综上,这批新发现的吐蕃金银器类型涉及面广,纹样题材丰富,制作工艺精湛,显示出独特的文化面貌,是吐蕃及青藏高原古代各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文化瑰宝和智慧结晶。这批新材料的发现和补充,使我们得以从历史、艺术、宗教和民族等不同角度加深对吐蕃时期青藏高原各民族交往、交流的理解与认识。下文将以若干典型器物为例,试作说明。

二、从金银器看吐蕃与唐朝的民族交融

吐蕃政权建立之初就积极地与其东面的唐王朝建立联系。《旧唐书》记载,“贞观八年,其赞普弃宗弄赞始遣使朝贡。”^[22]吐蕃的东向发展,尤其是攻占青海地区之后,得以直接与唐接壤,使其从黄河流域富裕的土地上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和人才资源^[23]。汉文文献中保存了大量唐蕃友好往来的史料,其中更是不乏有双方互派使者携带金银制品的记载^[24]。从近年新发现的实物材料来看,输入吐蕃境内的唐代金银器或在唐代金银器影响下生产制作的吐蕃金银器均不在少数。

高足杯是受西方文化影响而产生的一种类器物^[25],在8世纪中期以前的唐代金银器中十分流行^[26]。这种形制的器物目前在吐蕃金银器当中已发现两件,一件是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收藏的金高足杯(见图1-1)^[27],一件是新近公布的美国私人收藏的一件金高足杯(见图1-2)。两件器物在造型上的共同特征是:由杯身和细高圈足两部分组成,圈足与杯体连接处有圆饼状托盘,中部有“算盘珠”式的节,底部呈喇叭口状。这与齐东方教授划分的唐代A型银高足杯的形制特征相符,可举何家村出土狩猎纹银

高足杯(见图1-9)、沙坡村出土狩猎纹银高足杯(见图1-10)、临潼出土缠枝纹银高足杯(见图1-11)为例。^[28]大都会博物馆藏金高足杯杯身上装饰十二生肖分置于十二个格子内,相似的构图方式常见于隋至初唐时期的铜镜。^[29]两件吐蕃高足杯所饰缠枝纹、忍冬纹、三角纹也是唐代银高足杯上的常见纹样。不同的是,大都会高足杯装饰的龙纹、羊纹和美国私人收藏高足杯上的人物纹样具有浓厚的吐蕃本土风格。两件器物显示出吐蕃金银器与唐代金银器在造型艺术之间的交流与借鉴,是吐蕃工匠基于本土文化对外来文明的改造和创新。

“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金带把杯(见图1-3)和都兰热水墓地追缴金带把杯(见图1-4)的杯体均呈圆底碗形,是吐蕃带把杯最为流行的造型。与以往发现的几件吐蕃带把杯不同的是,这两件带把杯上、下腹部之间有一道折棱。造型相近的带把杯曾出土于陕西西安沙坡村(见图1-12)。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7至8世纪的唐代金银器中流行折腹器物,例如沙坡村莲瓣纹折腹银高足杯、白鹤联珠纹折腹银高足杯、耶鲁莲瓣纹折腹银高足杯和何家村、沙坡村出土的几件折腹银碗^[30]。吐蕃的折腹带把杯在唐代折腹器的基础上做出了一定改造,于腹部中间或上腹部起折棱,以适应本民族的审美情趣。

细颈瓶在南北朝迄唐前期的墓葬中时有出土,^[31]材质有陶、瓷、铜三种,可举长沙烂泥冲南齐墓出土青瓷瓶^[32]、河北景县封魔奴墓出土铜瓶^[33]、曲阳嘉裕村北魏墓出土铜瓶^[34]、山西长治北石槽唐墓出土陶瓶^[35]、太原南郊金胜村唐墓出土陶瓶^[36]等为例。这些器物对后来的唐代金银器产生一定影响,出现若干银质的细颈瓶,如震旦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海狸鼠纹银瓶(见图1-13)和戴·托恩艺术学院收藏的奔狮纹银瓶(见图1-14)^[37]。目前发现的吐蕃细颈瓶有十余件,如新发现的“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金细颈瓶(见图1-5)、都兰热水墓地追缴金细颈瓶和以往公布的普利兹克收藏鎏金银细颈瓶(见图1-6)、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收藏鎏金银细颈瓶(见图1-7)、牛津大学阿西莫伦博物馆收藏银细颈瓶(见图1-8)等。^[38]这些吐蕃细颈瓶均为喇叭口、细长

颈、鼓腹、圈足,应是在上述唐代中原地区流行的细颈瓶影响下出现的。从吐蕃细颈瓶上的纹样题材与内容来看,这一器型在传入青藏高原以后,为吐蕃贵族所接受,并对其进行了一定的改造与创新。

展的战略大格局密不可分。^[39]

三、从金银器看吐蕃与吐谷浑的民族交融

吐谷浑原为鲜卑人的一支,公元3世纪末开始西迁,行至今内蒙古阴山一带。4世纪初,因永嘉之乱而经陕西陇县抵达今青海西宁以西。5世纪末至6世纪初,吐谷浑逐渐向完善的国家体制过度,至6世纪中后期吐谷浑国都确立,并以青海湖为中心拓展成为疆域较为广阔的地方政权。至龙朔三年(663年),吐谷浑被吐蕃吞并灭亡。吐谷浑雄踞青海一带三百余年,对于维持东西方丝绸之路交通畅通、促进青海高原古代多民族交流与融合做出了贡献。^[40]

吐蕃攻占青海地区后,通过一系列军事、政治措施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加速了这一时期青海地区民族交融的历史进程。一方面,吐蕃使用政治力量对其统治区域推行民族同化政策,通过改易服色、语言、信仰及丧葬制度,使被其统治之下的汉人、吐谷浑人、羌人和中亚胡人等人群一时均有吐蕃化倾向。《新唐书·吐蕃传》载,吐蕃攻陷河陇之后,“州人皆胡服臣虏,每岁时祀父祖,衣中国之服,号恸而藏之”。^[41]唐代诗人白居易《缚戎人》注中也记:“有李如暹者,蓬子将军之子也。尝没蕃中,自云蕃法,唯正岁一日,许唐人之没蕃者,服唐衣冠,由是悲不自胜,遂密定归计也。”^[42]但另一方面,青海本土各民族的文化也在潜移默化中对吐蕃产生影响,形成各民族之间多向互动的态势。近年来,随着青海乌兰泉沟一号墓、都兰热水“2018血渭一号墓”等一批吐蕃统治下的高等级吐谷浑贵族墓葬的发掘,这一历史脉络已愈发清晰。对于这些墓葬在形制特征上反映出的多民族交流融合,笔者先前已做过一些论证,本文不再赘述^[43]。现就墓葬中出



1.大都会博物馆藏金高足杯 2.美国私人收藏金高足杯 3.都兰热水墓地追缴金带把杯 4.“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金带把杯 5.“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金细颈瓶 6.普利兹克收藏鎏金银细颈瓶 7.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鎏金银细颈瓶 8.阿西莫伦博物馆藏银细颈瓶 9.何家村狩猎纹银高足杯 10.沙坡村狩猎纹银高足杯 11.临潼缠枝纹银高足杯 12.沙坡村素面银带把杯 13.震旦艺术博物馆收藏海狸鼠纹银瓶 14.戴·托恩艺术学院收藏奔狮纹银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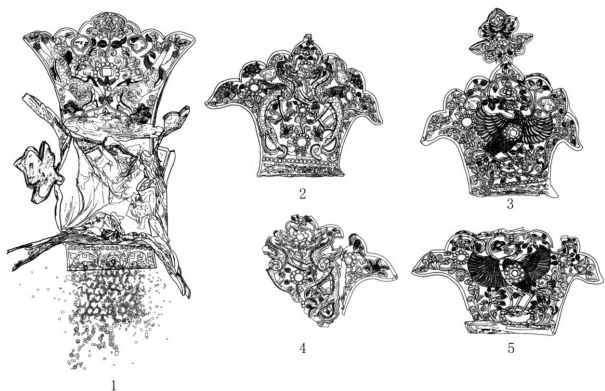
图1 吐蕃金银器与唐代金银器^①

吐蕃金银器中还有相当一部分纹样题材是取自唐朝,比较有代表性的纹样有凤鸟纹、龙纹、鸳鸯纹和“肉芝顶”鹿纹。稍加比较即可发现,吐蕃工匠在生产制作的过程中,并非直接照搬这些纹样或是简单的学习模仿,而是在理解其基本特征和意象的基础上加以创新,以适应本土需求。虽然较之粟特银器、波斯萨珊金银制品来看,唐代金银器开始大规模地对吐蕃金银器产生影响的时间略晚,但不可否认的是,唐代金银器所带来的影响更加深远且持久。这一方面是由于地理因素的制约和宗教信仰不同等客观条件,另一方面也与吐蕃主观上东向发

①图1-1采自大都会博物馆官方网站 <https://www.metmuseum.org>;图1-2采自索南航旦.论吐蕃时期的金银器[J].中国藏学(藏文版),2022(3);图1-3采自首都博物馆,青海省博物馆编.山宗·水源·陆之冲:一带一路中的青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219;图1-4、5采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青海都兰县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J].考古,2021(8);图1-6采自霍巍.吐蕃系统金银器研究[J].考古学报,2009(1);图1-7采自王旭东主编.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艺术珍品[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20:257;图1-8采自阿西莫伦博物馆官方网站 <https://collections.ashmolean.org>;图1-9、10、11、12、13、14采自齐东方著.唐代金银器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41,347,106.

土的重要金银制品进行探究,对这一时期吐蕃与吐谷浑之间的民族交融进行讨论。

迄今为止,相较于吐蕃腹心地区,青海一带出土的金银制品数量更加丰富。其中最为特殊的一件器物是乌兰泉沟一号墓暗格内出土的鎏金银冠(见图2)^[44]。该冠采用了捶揲、鎏金、镶嵌和篆刻等制作工艺,用五块造型相同的鎏金银片饰拼接而成。每个饰片的上缘呈中间高耸、两侧逐级下降且对称的弧形花边状,共七个连弧;连弧两侧的末端收分成尖角,整体似雄鸡之冠。饰片上均捶揲出动植物纹样,前、后冠面上饰双立龙与植物纹组合,左、右冠面上饰凤鸟与花卉枝蔓。护颈饰片上的图像布局与前后冠面整体相似,但将双龙改为了双狮。冠面镶嵌绿松石、青金石等众多的宝石,冠前系缀珍珠旒。



采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民族博物馆,乌兰县文体旅游广电局.青海乌兰县泉沟一号墓发掘简报[J].考古,2020(8).

图2 乌兰泉沟一号墓出土鎏金银冠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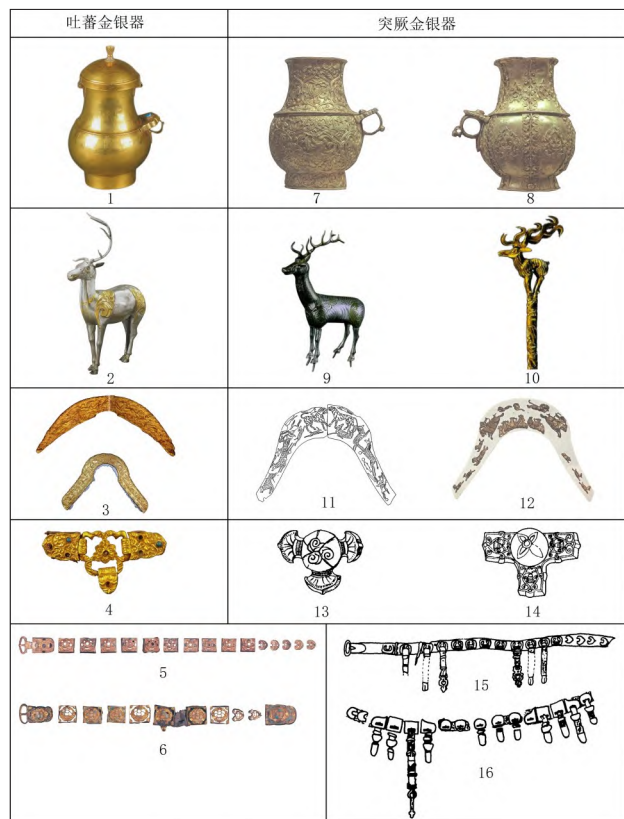
这顶银冠的造型较为特殊,是一种全新的冠帽样式,突破了以往我们对中国古代冠帽的认知。实际上,在此冠出土以前就已经有若干吐蕃冠帽材料的发现,只是由于保存状况不佳,暂未被识别认出。例如藏医药文化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鎏金银冠残片^[45]和普利兹克收藏的一组银冠构件^[46]。另外,在青海省海西州民族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彩绘棺板上可见,一身穿白衣骑者,头戴黄色高冠,其冠帽的形制与泉沟一号墓出土鎏金银冠如出一辙。^[47]从

上述材料来看,以泉沟一号墓鎏金银冠为代表的冠帽样式很可能是唐吐蕃时期青海地区曾存在过的一类较为常见的冠帽样式。

泉沟一号出土银冠的主体结构是用大块的鎏金银片拼合而成,这与中原内地的传统冠帽有着明显区别。在隋唐及以前中原地区的冠帽系统中,金银主要用于冠帽上的装饰或局部框架,如金花、金珰等。而古代北方草原文化中却存在用大块金银制作冠帽的传统,如内蒙古出土的匈奴鹰顶金冠饰^[48]、突厥金冠^[49]以及之后的辽代金银冠^[50]等。因此,这种以金银为主制作冠帽的传统,可能与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有关。但同时也应看到,泉沟一号墓鎏金银冠的样式与目前所见北方草原民族中常见的圆环状冠帽样式明显不同,采用的是方形的冠体样式,这可能又与中原的影响有关^①。中原冠帽文化的影响还表现在该冠前檐下所缀的珍珠旒,此类样式常见于初唐至五代敦煌壁画中的汉地君主、王侯所戴的冠帽,^[51]表明冠前缀旒的冠帽观念在当时西部地区贵族的服饰文化中已形成较大影响。而乌兰泉沟一号墓银冠前的网状珍珠旒又与中原王冠上的串状旒不同,应该是经过了相应的地域性改造。

再从此冠的装饰上看,多元文化交融的特征更为明显。银冠护颈饰片上的狮子尾巴与后肢交叉缠绕,此类形态的狮子在吐蕃时期非常流行,青海都兰科孝图墓地出土石狮^[52]、玉树大日如来佛堂泥塑狮子^[53]、玉树勒巴沟恰冈佛教摩崖造像大日如来座下石刻狮子^[54]、昌都邓马岩大日如来摩崖造像须弥座上的狮子^[55]均为此类造型。至后弘期这种狮子仍有发现,例如西藏山南扎囊县扎塘寺壁画中的狮子^[56]。由此可见,该件冠饰上的狮子纹样已经具有吐蕃文化的特征。同样,银冠上龙、凤纹样虽均为古代中原地区的传统纹样,但已经过本土化的改造,兼具唐蕃两地的多元文化特色。银冠上装饰的各类宝石也具有多元的文化特色,如青金石、珍珠等部分宝石,应当不是青藏高原本地所产,而是外来物品,这既是吐谷浑和吐蕃接续经营丝绸之路国际贸易的结果,也是青藏高原民族交融和文化多元的体现。

①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内地有一种被称为笼冠的冠帽,特征为内衬巾幘,外罩笼状硬壳,正视呈方形或长方形。参见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172-177.



1.大长岭吐蕃墓出土折肩金壶 2.普利兹克收藏鎏金银鹿 3.“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金鞍桥包片 4.都兰热水墓地追缴镶绿松石金节约 5、6.梦蝶轩收藏蹀躞带 7、8.科比内2号墓出土折肩金壶 9.毗伽可汗宝藏鎏金银鹿 10.俄罗斯图瓦共和国阿尔赞出土金鹿权杖 11.雅酷德尔格突厥墓出土骨质鞍桥饰 12.科比内2号墓出土鎏金鞍桥饰 13.库赖第4地点3号墓出土节约 14.秋赫加塔窖藏出土节约 15.图瓦突厥墓出土蹀躞带 16.阿尔泰吐埃特克塔4号突厥墓出土蹀躞带

图3 吐蕃金银器与突厥金银器^①

四、从金银器看吐蕃与北方草原的民族交融

由于地理位置的毗邻和民族习性的相近,随着各自势力的扩张,吐蕃与突厥这两个民族之间曾有过密切的交往。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记载,7世纪末至8世纪中期,吐蕃与突厥在六十余年间曾有过十余次的往来。^[57]同样在汉文史料中也记载,唐代吐蕃为其向西北发展的战略需要,与

突厥有过较为密切的联系,其交往的形式有互派使节、联合行动、缔结婚姻等。^[58]在此期间,突厥与吐蕃产生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与影响。这一背景在吐蕃时期的金银制品上有所反映。

大长岭吐蕃墓出土折肩金壶长颈,鼓腹,圈足,腹部带有把手,肩部有一圈凸起的折棱(见图3-1)。这种形制的器物在阿尔泰地区库赖草原和乌尔苏尔河沿岸的突厥大墓中有过出土,图雅赫塔3号墓和库赖第4地点1号墓中出土的两件银罐的底部还有突厥文铭记,因此孙机先生认为这种形制的器物应当是突厥特有的、独具民族色彩的器型。^[59]在米努辛斯克盆地西部叶尼塞河上游的科比内2号墓中,还出土了两件满饰纹样的折肩金罐(见图3-7,8),其环状把手上还有指垫,整体造型与大长岭吐蕃墓出土的折肩金罐一致。故将大长岭吐蕃墓出土折肩金罐视为一件突厥制品应当无误。

普利兹克收藏鎏金银鹿,头顶枝形大角,肩、臀部饰卷叶纹,局部鎏金(图3-2)。造型相似的鎏金银鹿在突厥毗伽可汗宝藏中曾出土过两件(见图3-9),^[60]区别在于后者的尺寸较小。以金银制作鹿雕像,在草原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俄罗斯图瓦共和国阿尔赞2号墓出土有一件金鹿权杖(见图3-10),年代约在公元前7世纪。突厥人继承了草原地区古代游牧民族的文化,在毗伽可汗为其弟所立的阙特勤碑碑额上也见有立鹿符号。^[61]普利兹克鎏金银鹿应是受到了突厥立鹿形象的影响而产生的。

吐蕃流行以金银为原料制作和装饰马鞍等各类马具(见图3-3),从它们的造型、工艺和装饰风格来看,这些鞍马具可能受到了突厥文化的影响。根据都兰吐蕃墓地出土的木质马鞍残件^[62]和普利兹克收藏的鎏金银马鞍^[63]可知,吐蕃的马鞍前桥呈直立状,后桥向后倾斜。孙机先生将这种造型的马鞍称为“后桥倾斜鞍”,系取法自突厥鞍。^[64]在装饰

①图3-1、2采自王旭东,等.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艺术珍品[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20:189,155;图3-3、4前鞍桥采自《青海都兰县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图三九,后鞍桥采自《山宗·水源·路之冲》第210、211页;图3-5、6采自苏芳淑主编:《金耀风华·赤鬃青骢——梦蝶轩藏中国古代金饰》第189—217页;图3-7、8、11、12采自仝涛.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考古学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21:342;图3-9、10采自林梅村.毗伽可汗宝藏与中世纪草原艺术[J].上海文博论丛,2005(1);图3-13、14采自孙机.论近年内蒙古出土的突厥与突厥式金银器[J].文物,1993(8);图3-15、16.采自冯恩学.蹀躞带——契丹文化中的突厥因素[J].文物季刊,1998(1).

风格上,吐蕃鞍桥饰流行成对的动物纹样,具有浓厚的草原游牧文化特色。此种风格也可以在突厥地区找到更早期的原型,例如南西伯利亚库德尔格(Kudyrge)突厥墓地出土的骨质鞍桥饰(见图3-11)和科比内2号墓出土的鎏金鞍桥饰(见图3-12)。^[65]吐蕃马具中还存在着一种“T”形节约(见图3-4),这种造型的节约也带有明显的突厥特色。库赖第4地点3号墓(见图3-13)和秋赫加塔窖藏(见图3-14)都出土有相似的“T”形节约。^[66]突厥马具和马饰对吐蕃金银器的影响可见一斑。

另外,目前发现的不少吐蕃蹀躞带(见图3-5、6)也受到了突厥文化的影响。蹀躞带起源于俄国阿尔泰地区,最早可见于公元前5世纪的巴泽雷克2号墓出的银鍔蹀躞带,到了突厥时期,蹀躞带迅速发展起来并在阿尔泰、图瓦等地的突厥墓中大量出土(见图3-15,16)。^[67]随着突厥的崛起及其与外部世界的交流,蹀躞带广为传播至其它地区。有研究表明,蹀躞带传到中原地区后对中国的隋唐及以后的带具形态有极大的影响。^[68]至于吐蕃蹀躞带的产生与发展,究竟是受到了突厥带具的直接影响,还是唐代带具间接影响,还有待考古新发现的佐证。

结语

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69]考古学进入青藏高原以后,为我们观察西藏历史与社会发展进程提供了最为直接的实物证明资料,对于改写和重建西藏古代的社会历史具有重要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一百年来中国考古学取得的巨大成就时所说的,考古学“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70]。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考古成果为更好地研究中华文明史、塑造全民族历史认知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它“揭示了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价值观和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考古成果还说明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国

家一体的形成发展过程”^[71]。

吐蕃政权是青藏高原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吐蕃政权建立后,通过一系列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措施,改变了小邦政权各自为政、分散孤立的发展局面,整合了各小邦政权和部落联盟,并最终成为一个地域辽阔的地方政权。与此同时,吐蕃政权成立之后,也积极向周边地区学习先进的制度、文化和技术,这为青藏高原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并对青藏高原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历史进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吐蕃遗留下来的文化遗物中,各类金银制品最为特殊,其制品精美、拥有者的社会地位显赫,为其他物质种类所不能比拟。这些金银器既能反映出吐蕃上层贵族的审美情趣,也能体现吐蕃工匠的工艺技术,是多角度考察和研究吐蕃古代社会历史的绝佳参照物。

通过本文对近年新发现的吐蕃金银器的研究与讨论,可以窥见来自西藏本土、中原唐王朝、北方草原地区和青海吐谷浑民族的文化因素相互交往、交流和交融的若干历史片断,从丰富的物质层面讲述了中国故事的西藏篇章,对于我们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来考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进程,进一步增强西藏各族人民的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均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38] 霍巍.吐蕃系统金银器研究[J].考古学报,2009(1).
- [2] 霍巍,祝铭.20世纪以来吐蕃金银器的发现与研究[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
- [3] Martha L. Carter. Three Silver Vessels from Tibet's Earliest Historical Era: A Preliminary Study[J].Cleveland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Art, 1998(3).
- [4] Amy Heller. The Silver Jug of the Lhasa Jokhang: Some Observations on silver objects and costumes from the Tibetan Empire (7th -9th century)[J].Silk Road Art and Archeology, 2003(9). Amy Heller. Archaeological Artefacts from 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 Orientations, 2003(34). Amy Heller. Tibetan Inscriptions on Ancient silver and gold Vessels and Artifacts

- [J]. 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Bon Research, 2013(1).
- [5] 许新国. 都兰吐蕃墓中鍍金银器属粟特系统的推定[J]. 中国藏学, 1994(4).
- [6] 霍巍. 吐蕃系统金银器研究[J]. 考古学报, 2009(1); 霍巍. 一批流散海外的吐蕃文物的初步考察[J].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07(5); 霍巍. 突厥王冠与吐蕃王冠[J]. 考古与文物, 2009(5).
-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等. 青海乌兰泉沟一号墓发掘简报[J]. 考古, 2020(8).
-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等. 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J]. 考古, 2021(8).
- [9] 李林辉, 扎西次仁. 西藏当雄发现吐蕃时期大型封土墓出土遗物见证与中原文化交往交流[N]. 文博中国, 2022-01-14.
- [10][11] 首都博物馆, 青海省博物馆. 山宗·水源·路之冲——一带一路中的青海[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9: 210-226, 188-189.
- [12] 盘龙城遗址博物院. 色如天相 器传千秋: 中国古代绿松石文化展[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2: 150-167; 青海省博物馆. 唐蕃古道: 七省区精品文物联展[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21: 44-84, 99-100.
- [13] 扬之水. 中国金银器(卷二)[M]. 北京: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2022: 456-476; 葛承雍. 金腰带与银腰带——从阿富汗大夏黄金之丘到青海都兰吐谷浑大墓[J]. 文物, 2019(1).
- [14][15][16][21] 王旭东. 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 吐蕃时期艺术珍品[M].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20: 80-309, 126-151, 215, 98-100.
- [17] Frantz Grenet, The Deydier Vase and Its Tibetan Connections: A Preliminary Note, Interaction in the Himalayas and Central Asia[M]. Vienna, Austria: Aust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Press, 2017: 91-103, Fig.1; David Thomas Pritzker. Allegories of Kingship: A Preliminary Study of a Western Central Asian Gold Ewer in the Royal Court of Tibet, Interaction in the Himalayas and Central Asia: Process of Transfer, Transl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Art, Archaeology, Religion and Polity[M]. Aust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Press, 2017: 105-126, Fig.8.
- [18] 王旭东. 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 吐蕃时期艺术珍品[M].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20: 106-293; 全涛. 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考古学研究[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21: 190.
- [19][67] 全涛. 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考古学研究[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21: 196.
- [20] 索南航旦. 论吐蕃时期的金银器[J]. 中国藏学(藏文版), 2022(3).
- [22]〔后汉〕刘昫, 等. 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5221.
- [23][39] 霍巍. 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6, 7.
- [24] 齐东方. 唐代金银器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297; 霍巍. 吐蕃系统金银器研究[J]. 考古学报, 2009(1).
- [25] 夏鼐. 近年中国出土的萨珊朝文物[J]. 考古, 1978(2); 孙培良. 略谈大同市南郊出土的几件银器和铜器[J]. 文物, 1977(9);〔日〕桑山正进. 一九五六年来出土の唐代金银器とその编年[J]. 史林(六十卷六号), 1977.
- [26] 齐东方. 唐代银高足杯研究[M]. 考古学研究(第二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206-218.
- [27] Amy Heller, Tibetan Inscriptions on Ancient silver and gold Vessels and Artifacts[J]. 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Bon Research, 2013(1).
- [28][30][37] 齐东方. 唐代金银器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41, 42, 106.
- [29] 后晓荣, 罗贤鹏. 十二生肖铜镜初论[J]. 四川文物, 2008(5).
- [31] 李静杰, 相宛升. 枣形腹、石榴形腹细颈瓶与梨形腹束颈瓶的谱系[J].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17(1).
- [32] 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长沙烂泥冲齐代砖室墓清理简报[J]. 文物参考资料, 1957(12); 湖南省博物馆. 长沙两晋南北朝隋墓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 1959(3).
- [33] 张季. 河北景县封氏墓群调查记[J]. 考古通讯, 1957(3).
- [34] 河北省博物馆, 文物管理处. 河北曲阳发现北魏墓[J]. 考古, 1972(5).
- [35]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晋东南文物工作组. 山西长治北石槽唐墓[J]. 考古, 1965(9).
- [36]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太原南郊金胜村唐墓[J]. 考古, 1959(9).
- [40] 周伟洲. 吐谷浑史[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1-135.
- [41] 新唐书(卷216《吐蕃传下》)[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19): 6101.
- [42]〔唐〕白居易. 白居易集笺校[M]. 朱金城, 笺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197-201.
- [43] 霍巍. 从青藏高原新出吐蕃墓葬看多民族的交流融合[J]. 中国藏学, 2022(4).
- [4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民族博物馆, 乌兰县文体旅游广电局. 青海乌兰县泉沟一号墓发掘简报[J]. 考古, 2020(8).
- [45] 李帅, 祝铭. 青海乌兰泉沟一号墓出土鎏金银冠初探[J]. 中国藏学, 2022(4).
- [46] 霍巍. 突厥王冠与吐蕃王冠[J]. 考古与文物, 2009(5).

- [47] 青海省博物馆. 尘封千年的岁月记忆:丝绸之路(青海道)沿线古代彩绘木棺板画[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170-171,202-203.
- [48] 鄂尔多斯博物馆. 鄂尔多斯青铜器[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132-133.
- [49] 林梅村. 松漠之间:考古新发现所见中外文化交流[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224-235.
- [50] 贾玺增. 辽代金冠[J]. 紫禁城,2011(11).
- [51] 敦煌研究院. 敦煌石窟全集24. 服饰画卷[M]. 香港:商务印书馆,2005:89-90,155,200.
- [52][56] 汤惠生. 略说青海都兰出土的吐蕃石狮[J]. 考古,2003(12).
- [53] 汤惠生. 青海玉树地区唐代佛教摩崖考述[J]. 中国藏学,1999(1).
- [54] 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青海玉树勒巴沟恰冈佛教摩崖造像调查简报[M].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藏学学刊(第16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7:148-163.
- [55] Amy Heller, Early Ninth Century Images of Vairochana from Eastern Tibet[J]. Orientation, 1994(vol. 25):74-79.
- [57] 王尧,陈践,译注.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M]. 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147-153.
- [58] 杨铭. 唐代吐蕃与突厥、回纥关系述略[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6).
- [59][66] 孙机. 论近年内蒙古出土的突厥与突厥式金银器[J]. 文物,1993(8).
- [60][61] 林梅村. 毗伽可汗宝藏与中世纪草原艺术[J]. 上海文博论丛,2005(1).
- [62]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都兰吐蕃墓[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49-51.
- [63] 王旭东. 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艺术珍品[M].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20:276.
- [64] 孙机. 唐代的马具与马饰[J]. 文物,1981(10).
- [67] 冯恩学. 蹀躞带——契丹文化中的突厥因素[J]. 文物季刊,1998(1).
- [68] 蔡高华. 隋唐时期带具的考古学研究[D]. 兰州:西北大学,2016:61.
- [69]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考古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1-2.
- [70][71] 习近平. 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J]. 求是,2020(23).

On Multi-ethnic Exchanges and Integration on the Qinghai-Xizang Plateau Based on the Newly Discovered Gold and Silver Artifacts of the Tubo

HUO Wei ZHU Mi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5)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s the archaeological work on the Qinghai-Xizang Plateau continues to advance, several exquisite gold and silver artifacts from the Tubo Period (an ancient Tibetan regime) have been discovered one after another. This period's gold and silver artifacts have different shapes and styles, showing diverse cultural connotations. From them, we can see the intermingling of cultural factors from local Xizang, the Central Plains of the Tang Dynasty, the northern grassland area and the Tuyuhun Ethnic group in Qinghai, which is a true reflection of the history of interaction and exchange between the various ethnic groups on the Qinghai-Xizang Plateau and its neighboring regions. It provides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rom a specific perspective to explore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pattern of the ethnic 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the Tubo Period; gold and silver artifacts; cultural factor analysis; ethnic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责任编辑:阿贵]